

《詩經》「鳥獸草木」意蘊世界新探

李金坤*

摘要

《詩經》中「鳥獸草木」等動植物計有 250 餘種，它們不僅是博物學層面的功能符號、社會學層面的文化符號，而且是文藝學層面的情感符號，更是教育學層面的啓蒙符號。這四個知識層面都是先民們親近自然、友愛自然的美好結晶，也是孔子「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深層內涵之所在。闡析《詩經》自然生態之審美意蘊，旨在激發與增強今人關愛自然之意識。

關鍵字：《詩經》 鳥獸草木 功能符號 文化符號 情感符號 啓蒙符號 意蘊世界

* 江蘇大學文法學院，江蘇，鎮江，212003。

Analysis on the Ecological Thinking in Shi Jing

Li Jinkun^{*}

Abstract

There are about 250 kinds of creatures in *Shi Jing*. Most of them are birds, beasts and plants. They are not only functional symbols of naturalism and cultural symbols of sociology, but also the emotional symbols of arts and the initiating symbols of education. All the four aspects are results of our forebears' friendly relationship with nature and are the deep roots of Confucius' words of 「To get to know the names of these birds, beasts, and plants」. The key purpose of the analysis on the aesthetics of ecological thinking is to initiate and strengthen modern people's love for nature.

Key Words: *Shi Jing*; birds, beasts and plants; functional symbols; cultural symbols; emotional symbols; initiating symbols; Confucius; love for nature

^{*} School of the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Su Zhou University, Su Zhou 215021, China

《詩經》是中國詩歌的最早總集。《詩經》研究，經久不衰；時至今日，盛況空前。「詩經學」已成為中國古典文學研究中的一門「顯學」。然而，對於《詩經》中所體現出來的濃厚的自然生態意識與重要的審美價值，迄今尚無較為系統而全面的探研。筆者擬就此作一試探，力求彰顯我國先民們親近自然、關愛自然、以物為友、利用自然的自然生態審美意識，進而探明物我相諧、情景交融意境論的生成機制與賦、比、興文學理論產生之根源。並就孔子「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論語·陽貨》）之著名論斷進行新的詮釋，為增進當下公眾自然生態的審美意識，奉獻綿薄之力。

打開中國最古老的一部詩集《詩經》，從開宗名義的第一篇《周南·關雎》中雙雙鳴叫的「雎鳩」，到最後一篇《商頌·殷武》中挺拔參天的「松柏」，全書遍佈動植物名稱。據清代學者顧棟高《毛詩類釋》統計，《詩經》中動、植物種類計有 337 種，其中：鳥類 43 種，獸 40 種，草 37 種，木 43 種，蟲 37 種，魚 16 種，穀類 24 種，蔬菜 38 種，花果 15 種，藥物 17 種，馬 27 種。此乃較為寬泛的統計。著名學者楊公驥先生統計為：草類 100，木 54，鳥 38，獸 27，昆蟲、魚 41，共 260 種。¹ 較為準確的統計當推孫作雲先生，他在排除了「一物多名」，或「一名多物」等重複因素外，最終統計是：「《詩經》305 篇，共記載動、植物 252 種；植物為 143 種，內含草類 85 種，木類 58 種；動物為 109 種，內含鳥類 35 種、獸類 26 種、蟲類 33 種、魚類 15 種。」² 短短 305 篇的《詩經》中，卻呈現出如此壯觀的動植物王國，實在是一道奇異多彩而內涵豐蘊的自然風景線。

《詩經》中這麼多的動植物描寫，並非是一種偶然的文學現象。《詩經》全部的創作時間大約包括周初至春秋中葉這 500 餘年中。這一時期正是我國奴隸制向封建制轉化的階段。生產力水準低下，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形式牢牢地把我們的祖先固定於農業生產的環境中。他們朝朝暮暮、年復一年生活勞作在大自然的懷抱裡，和大自然進行零距離親密接觸。外部世界的風雲變幻、花開花落、魚躍鸞飛、日月星辰等等，都能使先民們產生一種生命的共感。正如馬克思所說：「生產不僅為主體生產物件，也為物件生產主體。」（《政治經濟學批判導言》）因此，長期以來作為人的勞動對象的大自然包括草木鳥獸蟲魚在內種種活潑的生命形態，便逐漸相應地創建出一個能充分敏銳地感受它的審美主體。在他們的眼裡，大自然的一草一木、鳥獸蟲魚等動植物是那樣的親切可愛，而與他們的生活又是那樣的息息相關，不可分離。諸如關關雎鳩，灼灼桃花，蒼蒼蒹葭，依依楊柳，都能自然地成為他們求偶、婚慶、渴望、思戀之情感的美好寄託與象徵。這些，在《詩經·國風》中表現得更為普遍而突出。這是因為，《國風》民歌中的作者，基本都是下層勞動人民，他們處於農業勞動的第一線，所以，《國風》中的自然生態意識就顯得更為鮮明突出，豐富多彩，也更具有審美價值。

對於《詩經》動植物描寫之功用與美學價值，是孔子最早發現並給予相當熱切地關注與

¹ 楊公驥：《中國文學：第一分冊》。（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80），頁 258～259。

² 孫作雲：《詩經研究》。（鄭州：河南大學出版社，2003），頁 7。

發掘。他在強調了《詩三百》的「興、觀、群、怨」四大詩教功能之後，強調要「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論語·陽貨》）。何以「多識」？孔子只是懸而未答。而「多識」的深意，也未能引起人們足夠的注意。一般人多停留在《詩經》博物學知識層面來理解。這方面則以劉寶楠《論語正義》的解釋為代表，其云：

鳥獸草木，所以貴多識者，人飲食之宜，醫藥之備，必當識別，匪可妄施。故知其名，然後能知其形、知其性。《爾雅》於鳥獸草木，皆專篇釋之。而《神農本草》，亦詳言其性之所宜用。可知博物之學，儒者所甚重矣。

在此基礎上，葉舒憲先生又作了進一步的發揮。他說：

《詩經》雖不是原始時代的產物，但它去古未遠，在相當多程度上保持著文明時代以前對自然萬物的細微區別和具體知識，尤其是具有咒術意義和藥用價值的各種動植物，這些對於孔子時代的文明人來說已經顯得有些陌生了，所以孔子希望借助於學習《詩經》，能使人物恢復當初那種人與自然息息相關相通的親緣關係，保持對一草一木的細微認識和敏銳體察。這種期望中所蘊含的人類生態意義絕非記憶名稱所能包容。³

這樣的解釋固然有其合理性，但就《詩經》提供的大量動植物資訊觀之，其功用價值與文化審美意義絕非僅此而已。那麼，孔子為何要強調「多識鳥獸草木之名」呢？這的確是個令人困惑的問題，連當代著名美學家李澤厚先生也不得不為此生出疑竇：

為什麼要『多識鳥獸草木之名』，是求自然知識還是另有用意？也許，此鳥獸草木之名乃或巫術或圖騰之象徵符號？其『名』均有歷史之『實』在？故『述而不作』之孔子如是說？不可知也。」⁴

其實，孔子「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的豐富而深刻之內涵是可以理解的。筆者認為，可從四個層面探析《詩經》自然生態意識的審美價值。

其一，從博物學層面看，可以讓人們去全面瞭解和掌握各種動、植物的名稱、形狀、性能功效等，為現實生活服務。自從孔子提出「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的話語權之後，人們便開始注重對《詩經》動植物名稱的解釋。我國現存最早的《詩經》注釋本《毛傳》（即毛亨的《詩故訓傳》），曾開注釋《詩經》動植物名稱之先河，影響很大。我國第一部字典《爾雅》多襲用其注釋，特別是有關動植物部分，分別輯入《釋草》、《釋木》、《釋蟲》、《釋魚》、《釋鳥》、《釋獸》、《釋畜》七部分中，若將這七部分匯聚起來，堪稱一部《生物學辭典》。到了三國時代，終於誕生了我國第一部生物學著作，這就是吳國吳郡人陸璣的《毛詩草木鳥獸蟲魚疏》（後人多簡稱為《草木疏》、《義疏》、《陸疏》、《詩疏》）。陸璣是一位本草學家，對草類記

³ 葉舒憲：《詩經的文化闡釋》。（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2004），頁 99。

⁴ 李澤厚：《論語今讀》。（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4），頁 478。

載尤詳。如釋「參差荇菜」曰：

荇，一名接余，白莖，葉紫赤色，正圓，經寸餘，浮在水上，根在水底，與水淺深等，大如釵股，上青下白，煮其白莖，以苦酒浸之，脆美可案酒。

又如釋「莎雞振羽」曰：

莎雞如蝗而斑色，毛翅數重，翅正赤，或謂之天雞。六月中飛而振羽，索索作聲，幽州人謂之蒲錯。

對每一動植物的名稱、地域、形狀、特徵、功用等，均有較為詳實而準確的解釋。後世研究《詩經》動植物的專門著作，多以此書為基礎而加以補充、考證之。如北宋·蔡卞《毛詩名物解》二十卷，明·吳雨《毛詩鳥獸草木考》二十卷，明·林兆琦《毛詩多識編》七卷，清·毛奇齡《續毛詩鳥名》三卷，清·姚炳《詩識名解》十五卷，清·陳大章《詩傳名物集覽》十二卷，清·多隆阿《毛詩多識》二卷，等等，蔚然形成了一門「毛詩名物注釋學」的專門之學。此外，對《詩經》動植物的研究，還產生了圖譜一類的著作。如《隋書·經籍志》載：「梁有《毛詩圖》三卷」。《新唐書·藝文志》載有「《毛詩草木蟲魚圖》二十卷」。南宋初年畫家馬和之有《毛詩圖》巨帙。可惜這些圖譜皆失傳了，現只有清·徐鼎《毛詩名物圖說》九卷傳世（此書作於乾隆四十九年，原刊本）。值得稱道的是，由臺灣學者潘富俊撰述、呂勝由攝影的《詩經植物圖鑒》已於2003年1月由上海書店出版社出版。該書首列原詩，然後就詩中植物名稱專設「植物小檔案」。從「今名」、「學名」、「類別」、「別稱」及基本生物學知識進行全面介紹，同時就植物名稱的有關文學現象，文化意義、習俗與效用等進行簡要闡析，並配以該植物不同生長時期的四幅精美彩照（每種植物皆同），既具知識性、科學性，又具觀賞性、可讀性，是一部直觀再現《詩經》植物的空前佳作。茲舉該書對《周南·桃夭》中「桃」的文化意蘊的闡析：

桃花花期雖短，但「落盡殘紅綠滿枝，留下瓊脂注子紅」，或「夾道桃花新遇雨，馬蹄無處避殘紅」等淒美景觀卻令人低回不已。《紅樓夢》中林黛玉及《桃花扇》中李香君所葬之花就是桃花。桃花鮮紅華麗，因此，《周南·桃夭》以「桃之夭夭」盛讚桃花之豔容。至於桃木，則是民間的辟邪之物，而且行之有年，其辟邪方法如下：（1）以桃枝編成掃帚，稱為「桃茢」，如《禮記》：「王吊則巫祝以桃茢前引。」（2）用桃木制弓，即「桃弧棘矢，以除其災」。（3）將桃枝插於門戶之上。（4）刻桃木為印，掛於門上；或立桃人於門邊。（5）桃木煮湯潑灑四處。（6）用桃木製成桃符釘在門上，此風俗後來演變為春聯。也有用桃花幫小孩洗臉者，據說可使小孩出落得漂漂亮亮。桃花在《詩經》以至漢唐時代都是廣為稱頌的植物。但自宋代以後，其形象開始改變，甚至有「妖容」之稱，明朝時更是「桃價不堪與牡丹作奴」，並以娼妓喻之。在文人及一般人眼中，

桃花已是負面字辭了。⁵

圖文並茂，娓娓道來，給人以甚為愜意的閱讀快感，不愧為《詩經》植物圖解的精美力作。

以上論列，皆是從博物學層面來研究《詩經》之動植物名稱的，屬於基本的外在的文化層面。

其二，從社會學層面看，大量的動植物如魚、螽斯、麇、木瓜、木桃、木李、梅子、花椒、秉藺、芍藥等，都與戀愛、婚姻、生子、修禊等習俗有關，反映了先民對動植物的崇拜心理與情愛意識。關於魚的自然生態的社會學意義，聞一多先生《說魚》一文論之甚詳，他例舉了《周南·汝墳》、《齊風·敝笱》、《邶風·新台》、《豳風·九罍》、《召南·何彼穠矣》、《衛風·竹竿》、《檜風·匪風》、《陳風·衡門》、《曹風·侯人》等詩篇中有關魚的形態、打魚、釣魚、烹魚、吃魚以及食魚的鳥獸等描寫，從中華民族文化心理的深層來探析魚文化內涵，認為這些內容都與青年男女的戀愛、婚姻、生育等現象緊密相關，是上古時代先民們普遍存在的一種文化的心理形態。至於何以用魚來象徵配偶的原因，聞一多先生分析說，我們中華民族之先民對「種族的繁殖既如此被重視，而魚是繁殖力最強的一種生物，所以在古代，把一個人比作魚，在某一意義上，差不多就等於恭維他是最好的人，而在青年男女間，若稱其對方為魚，那就等於說：『你是我最理想的配偶！』現在浙東婚俗，新婦出轎門時，以銅錢撒地，謂之『鯉魚撒子』，便是這觀念最好的說明。」又如螽斯，這是蝗蟲一類多子的蟲，具有很強的繁殖生育能力。《詩經》時代生產力甚為低下，故人們十分注重人口繁育。人們在日常勞動中司空見慣於繁殖旺盛的螽斯，因此也就自然祈望人們能夠像螽斯那樣繁育後代，生生不息。《周南·螽斯》便是體現人們這種美好願望的一首詩。全詩三章，首章云：「螽斯羽，詵詵兮。宜爾子孫，振振兮」。詩人用蝗蟲多子比喻人多子，表示對多子者的祝賀，其中也蘊含著作者對多子者的崇拜心理。在青年男女互贈禮品的習俗中，多出現「麇」、「木瓜」等動植物。《召南·野有死麇》句：「野有死麇，白茅包之。有女懷春，起士誘之。」這裡說，一位青年獵人，在郊外叢林裡遇見了一位溫柔如玉的少女，出於對她的愛慕之情，他就把剛剛獵獲的小鹿用潔白的白茅草包裹著送給她。因此，小夥子終於獲得了少女的芳心。「木瓜」、「木桃」、「木李」等也是常見的青年男女相互贈送的禮物之一。如《衛風·木瓜》：「投我以木瓜，報之以瓊琚。匪報也，永以為好也。」「投我以木桃，報之以瓊瑤。匪報也，永以為好也。」「投我以木李，報之以瓊玖。匪報也，永以為好也。」程俊英、蔣見元分析此詩可謂中肯入髓，精神全出。認為：

詩共三章，每章末疊唱『匪報也，永以為好也』二句，看似重複，詩的精神卻全從此二句生出。人贈以木瓜，我意欲報之以瓊瑤，報答不可謂不重，但如果詩就此而止，則恃富炫貴而已，沒有什麼可稱道的。而下緊接『匪報也』三字，露出作者之意，原

⁵ 潘富俊，呂勝由：《詩經植物圖鑒》。（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3），頁25。

不在物，僅欲表其愛慕之誠，以永結情好。這一轉折，頓時別開生面，有山重水複，柳暗花明之妙。⁶

梅子，在《詩經》中是一個浸染女子情愛焦慮意緒的意象。《召南·摽有梅》是其典型代表。其詩云：「摽有梅，其實七兮。求我庶士，迨其吉兮。」「摽有梅，其實三兮。求我庶士，迨其今兮。」「摽有梅，以筐塹之。求我庶士，迨其謂之」。此詩巧妙選取梅子由多到少不斷脫落的自然現象，十分形象地表現出待字女子時不我待而婚嫁難成的焦灼心理。梅子，其味酸澀，故亦寓含詩中女主人公嫁不以時的淒楚況味。花椒，果實暗紅色，熟即裂開，子粒甚多，味辛而香烈，可入藥而調味。因其子多而香，故多以花椒喻指婦女多子。屈原《湘夫人》云：「蓀壁兮紫壇，播芳椒兮成堂」。湘君為湘夫人營構的閨房高貴而香氣四溢。漢朝人就將皇后住的房屋稱之為椒房，長樂宮就有椒房殿，這主要取其多子吉祥之意。應劭《風俗通》云：「《漢官儀》，皇后稱椒房，取其蕃實之義也。《詩》曰：椒聊之實，蕃衍盈升」。聞一多《風詩類鈔》：「《椒聊》喻多子，欣婦女之宜子也。」人們崇拜花椒，實是崇拜多子思想之反映，與螽斯之崇拜心理，具有異曲同工之妙。《唐風·椒聊》，便是這樣一首以多子之椒聊來喻贊婦女多子的詩，體現了當時社會崇尚多子多生的生育習俗。鄭國上巳節，青年男女多在溱水、洧水河畔遊春，互贈香草鮮花。一方面用以拂除不祥，一方面表達雙方的愛戀之情。《鄭風·溱洧》便是這樣的一首詩。全詩二章，首章云：「溱與洧，方渙渙兮。士與女，方秉蘭兮。女曰：『觀乎？』士曰：『既且』。『且往觀乎？洧之外，洵訏且樂』。維與女，伊其相謔，贈之以芍藥」。其中的「秉蘭」、「芍藥」，即青年男女各自手持香草與芍藥之花奉獻雙方，以表達純樸至誠的情愛之意。以上從社會學的層面，對《詩經》中部分動植物所寓含的文化內涵進行了粗略的論析。由此可知，「符號化的思維和符號化的行為是人類生活中最富於代表性的特徵」。⁷而這些在「藝術中使用的符號是一種暗喻，一種包含著公開的或隱藏的真實意義的形象」。⁸

其三，從文藝學層面看，孔子提出「興、觀、群、怨」的《詩三百》的教育功能，是建立在《詩三百》大量的「鳥獸草木」基礎之上的。人們在與自然長期接觸的過程中，不僅熟諳於鳥獸草木之形態，準確形象而生動地描摹出它們的形貌聲色，而且還能深悟鳥獸草木之精神。久而久之，便逐漸地領悟到人與自然相通的情感功能，從而成功地創造出詩歌賦、比、興的藝術表現手法，人們因此而能夠自覺地借物抒情，或因情托物，為後世「情景交融」意境論的產生奠定堅實的基礎。關於《詩經》賦、比、興藝術手法之概念的解釋，學界大多推崇于朱熹《詩集傳》中的傳箋。其云：

賦者，鋪陳其事而直言之者也。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興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詠

⁶ 程俊英，蔣見元：《詩經注釋》。（北京：中華書局，1991），頁191～192。

⁷ 恩斯特·卜西爾：《人論》。（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1985），頁35。

⁸ 蘇珊·朗格：《藝術問題》。（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3），頁134。

之詞也。⁹

朱熹所講「比」、「興」中的「物」較為明顯，即指《詩經》中的動植物。而「賦」中所言之「事」，其內容就較為寬泛，當包括動植物在內的物事與人事。要之，賦、比、興構成的主要因素則為動植物的「物」。稍覺遺憾的是，朱熹對此論述尚欠明確。而同時代的李仲蒙對賦、比、興概念的解釋，卻突出了「物」（動植物）對於形成賦、比、興藝術手法的重要性。其論述較之朱熹更為鮮明準確而切合《詩經》實際，在歷代有關賦、比、興概念的解釋中，是最為妥貼的。他對賦、比、興解釋說：

敘物以言情，謂之「賦」，情物盡者也；索物以托情，謂之「比」，情附物者也。觸物以起情，謂之「興」，物動情者也。故物有剛柔緩急榮悴得失之不齊，則詩人之情亦各有所寓」。（李仲蒙語見胡寅《與李叔易書》，四庫全書珍本初集本《裴然集》卷十八）

李仲蒙關於賦、比、興論述的高明獨斷之處，在於他點明了「物」（動植物）是賦、比、興共同依託的必要因素。為此，清代著名文學批評家劉熙載十分讚賞李仲蒙對賦、比、興概念的界說，認為：「此明賦比興之別也。」¹⁰ 李仲蒙把賦、比、興的界定準確地建立在情與境的結合，也即處理情與物的關係上，這是甚為準確而別具藝術眼光的。作為抒情文學而言，其共同規律便是「感物造端」（班固《漢書·藝文志》），「遵四時以歎逝，瞻萬物而思紛」（陸機《文賦》），「情以物興」、「物以情觀」（劉勰《文心雕龍·詮賦》）。「物色之動，心亦搖焉」（《文心雕龍·物色》）。其感情的產生，無不來自動植物的激發。王文生先生對賦、比、興不同的特點作過頗為簡明的解釋。他說：「賦的特點是陳情於物；比的特點是移情於物；興的特點是則藉物興情。」¹¹ 「物」是賦、比、興形成的根本要素，倘若沒有豐富多彩的動植物，賦、比、興則將成為無源之水、無本之木矣。

那麼，《詩經》中的動植物是如何體現於賦、比、興表現手法，而一展其藝術風采的呢？首先，看「陳情於物」的「賦」。這類詩多直接鋪敘動植物的形狀、性質和活動來抒發作者的感情。《豳風·七月》，是一首描寫農民一年四季勞動過程與生活情景的農事詩，農民們「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朝朝暮暮與大自然為伍。因此，在這首詩中便自然而然地出現了許多動植物的描寫，諸如倉庚（黃鶯）、柔桑、繁草、萑葦（荻草和蘆葦），鳴鵪（又名伯勞），秀蓼（不開花而結籽的遠志），鳴蜩、貉、狐狸、豸（小獸）、豸（大獸），斯螽（蚱蜢），莎雞（紡織娘），蟋蟀、鼠、鬱（果如李子），藟（野葡萄），葵菜、菽（豆類）、棗、稻、瓜，壺（葫蘆）、茶（苦菜）、樗（臭椿樹），黍（小米）、稷（高粱）、重（後熟作物）、穆（早熟作物）、麻、麥、羔羊、韭菜等，計 30 餘種動植物名稱，儼然一部微型動植物譜志也。如此娓娓鋪陳

⁹ 宋·朱熹：《詩集傳》。（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58），頁 1-4。

¹⁰ 清·劉熙載：《藝概》。（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頁 86。

¹¹ 王文生：《論情境》。（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2001），頁 176。

之賦法，其作用與意義有二：一是全面而真切地再現農民活動場景，具有樸實醇厚的農村風味；二是寓農民勞作之艱辛于平實的描寫之中，盡顯農民生活苦難之情狀，具有言外之意的含蓄美風格。此詩第四章云：「五月斯螽動股，六月莎雞振羽。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戶，十月蟋蟀入我床下。穹窒熏鼠，塞向墜戶。嗟我婦子，曰爲改歲，入此室處」。通過「斯螽」、「莎雞」、「蟋蟀」等動物在不同季節中的生活特徵，來巧妙而不動聲色地反映時間之變化，可謂自然高妙也。尤其是敘寫蟋蟀由外而內、直至床下的地點變化，清晰地勾勒出一幅天氣由炎熱而變寒冷的歲月流程圖，不著一「寒」字，而只覺「寒氣」逼人。「其體物微妙，又何精緻乃爾。」¹²《鄭風·溱洧》描寫青年男女互贈香草鮮花，亦是使用賦之手法。充分體現了男女雙方誠摯美好的戀情與對未來幸福生活的嚮往之意，可謂典型的陳情於物、以物傳情者也。此外，如《魏風·碩鼠》、《小雅·鶴鳴》等，都是全篇以賦之手法來展示動植物的名篇。不過，這類賦法中尚含有比的成分，是屬於賦之手法的延伸與擴展。

其次，看「移情於物」的「比」。以上所述《魏風·碩鼠》、《小雅·鶴鳴》都是全篇以動植物作爲「比」的媒介物的。《鄘風·相鼠》、《幽風·鸛鳴》亦是全篇設比的名篇。前者以「相鼠有皮」、「相鼠有齒」、「相鼠有體」來反比出那些寡廉鮮恥者「無儀」、「無止」、「無禮」的醜惡行徑，憤恨之情，溢於言表；後者是一首別具一格的禽言詩。它借助於禽鳥的悲鳴自敘遭受強暴者欺凌的淒慘命運。鸛鳴，即貓頭鷹。古人認爲是猛禽惡鳥，這是用來比喻強暴者。詩中的「予」，比喻受欺凌的弱禽鳥。《詩經》中還有許多連用一系列動植物作博喻的生動例子。如《衛風·碩人》描寫莊姜之美：「手如柔荑，膚如凝脂。領如蝤蛴，齒如瓠犀。螭首蛾眉」，用多種比喻寫莊姜之美，極爲形象生動，宛若一幅活生生的儀態萬方的美人圖。方玉潤稱道：「千古頌美人者無出此二語，絕唱也。」¹³《小雅·斯干》寫周王朝宮室落成時的雄偉壯觀而姿態優美的萬千氣象：「如跂斯翼，如矢斯棘，如鳥斯革，如翬斯飛，君子攸躋」（端正有如人企立，齊整有如利箭急，寬廣好似鳥展翼，華麗賽過錦毛雞，君子登堂心歡喜）。¹⁴通過一系列動植物生動形象而貼切的比喻，進一步揭示事物的本質特徵，給人以深刻的印象和回味的餘地。比喻之妙，存乎一心。

最後，看「借物起情」的「興」。《詩經》中以動植物起情者大多在篇章之首，亦有在篇章之中與篇章之尾者。如《周南·關雎》：「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王風·黍離》：「彼黍離離，彼稷之苗」；《小雅·鹿鳴》：「呦呦鹿鳴，食野之蘋」等等，興句皆置於篇章之首。興句置於篇章之中者，如《衛風·氓》：「桑之未落，其葉沃若。於嗟鳩兮！無食桑葚。」「桑之落矣，其黃而隕」。興句置於篇章之尾者，如《小雅·采薇》：「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小雅·何草不黃》：「有芃者狐，率彼幽草。有棧之車，行彼周道。」像這類興

¹² 清·方玉潤：《詩經原始》。（北京：中華書局，1986），頁307。

¹³ 清·方玉潤：《詩經原始》。（北京：中華書局，1986），頁177。

¹⁴ 程俊英：《詩經譯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頁353。

句，大多具有興中含比的成分，內蘊豐厚，有利於表達詩歌的主旨。《詩經》中以動植物起情的句子，不僅能夠引發人們的聯想，撥動情感的琴弦，而且常常起到醞釀氣氛，構成優美意境的重要作用。如《周南·桃夭》首章云：「桃之夭夭，灼灼其華。之子於歸，宜其室家」。起句描摹春光中的桃樹生長茂盛、桃花鮮豔盛開的美好景象，對下文芳齡女郎的婚嫁，正好起到一個烘雲托月的渲染作用，呈現出一派生機勃勃，熱烈祥和的喜慶氣氛，別具情景交融的意境之美。劉勰《文心雕龍·物色》篇云：「詩人感物，聯類不窮。流連萬象之際，沉吟視聽之區。寫氣圖貌，既隨物以宛轉；屬采附聲，亦與心而徘徊。」此正可以作為《桃夭》興句意義的理論說明。再看《秦風·蒹葭》首句之「興」：「蒹葭蒼蒼，白露為霜」。詩人以輕筆淡墨為人們勾勒了一幅獨立清秋蕭瑟圖。詩中主人公「求之不得」的惆悵之情與眼前這派秋水迷茫之景渾然相融，構成了淒情迷離的藝術境界。千載之下，仍然具有動人的藝術魅力。

王國維認為：「昔人論詩詞，有景語、情語之別。不知一切景語皆情語也。」¹⁵《詩經》中大量的動植物描寫，為賦、比、興表現手法提供了廣闊的活動舞臺，也為抒發《詩經》作者們的思想感情帶來了極大的便利。在長期與大自然接觸的過程中，先民們逐漸認識到「天有風雨寒暑，人亦有取與喜怒」（《淮南子·精神訓》）的對應關係。這種「天人合一」的文化心理的不斷自覺化、細膩化、美學化的表現，便是物我交感、情景交融意境論生成的審美體驗。

所以，傳統詩歌所表達的情感趨向於人與自然融凝合一的意境：一方面「詩人以月露風雲花草為其性情」（黃宗義《南雷文案·景州詩集序》），大自然把它那清幽明潔或雄奇高遠的種種氣質灌注到詩人的詩思血液裡，使他們獲得雲的氣韻、清泉的心境、月的皎潔和清風的鮮氣。另一方面，「仁者樂山，智者樂水」，詩人又把他那高人的節操、逸士的風神、幽人的胸襟、志士的豪氣，投射到大自然山水草木之中，使之獲得人化的品格。¹⁶

這種人與自然和諧統一，便是我國古代美學思想的一個重要特徵，這一特徵在我國古代文學的發展過程中留下了深深的印記。這就是所謂「神與物游」（劉勰《文心雕龍·神思》）者也。劉勰認為，這「神與物遊」的「思理之妙」，正是藝術構思之極致也。《詩經》作者們大量動植物的描寫，孕育了具有民族特色的賦比興藝術手法。

別的民族在詩歌創作中，也會有直敘、比喻或借物抒情等表現方法。但是，要形成賦比興這樣一個完整體系，被視為「詩學之正源，法度之準則」，並長期在詩、賦、詞和繪畫中普遍使用，又為廣大讀者所喜聞樂見，這就是我們民族所獨有的了。因此，由

¹⁵ 王國維著，滕咸惠校注：《人間詞話新注》。（濟南：齊魯書社，1986），頁50。

¹⁶ 胡曉明：《傳統詩歌與農業社會》。（文學遺產，1987，（2）：1-8），頁4。

賦比興所決定的藝術構思特點，就是我國古代詩歌創作構思的特點。¹⁷

由此可見，《詩經》作者們由大量描寫動植物而孕育成的賦比興藝術手法，對我國文學藝術構思的發展與意境論的產生，作用至大，功不可沒。

其四，從教育學層面看，孔子的思想核心是「仁」，而「仁」在現實生活中則具體表現為「和」，即：不但人與人之間要「和」，而且人與自然之間也要「和」。在孔子看來，《詩三百》中寫了那麼多「鳥獸草木之名」，正是人們親近自然、仁愛自然的最好注腳。它無形中起到了教育人們關愛自然、尊重自然的重要作用。現在我們有必要對孔子「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的著名論斷作一次重新解讀。

孔子《論語·陽貨》篇云：「小子何莫學夫詩？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歷代翻譯者甚多，茲舉楊伯峻譯注為例。其譯文為：

學生們為什麼沒有人研究詩？讀詩，可以培養聯想力，可以提高觀察力，可以鍛煉合群性，可以學得諷刺方法。近呢，可以運用其中道理來事奉父母；遠呢，可以用來服事君上；而且多多認識鳥獸草木的名稱」。¹⁸

楊伯峻先生是研究先秦諸子的權威之一，其譯注頗具有代表性。現行譯注本大多未出其注文範圍。不過，此段譯文卻有欠妥之處。對何以產生「興、觀、群、怨」詩教功能的關鍵問題，楊先生未予點明。光是說「讀詩，可以培養……」之類，失之籠統。竊以為，能夠產生「興、觀、群、怨」詩教效果的關鍵問題，當是指《詩經》中具體寫到的大量的「鳥獸草木之名」。本文上述賦、比、興表現手法所涉及的眾多動植物名稱，便都具有「興、觀、群、怨」的詩教功用。所謂「興」，即觸物聯想，激發情感。如《周南·關雎》由「在河之洲」的「關關雎鳩」，便會自然聯想到青年男子對女子的追慕之情，並由此詩進一步聯想到「《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論語·八佾》）的思想風格。此之謂「可以興」也。孔子在《論語·泰伯》中又說：「興于詩，立于禮，成于樂」。其中的「興於詩」與「可以興」，其意一也。所謂「觀」，即觀物增知並進而瞭解社會政治、風土人情也。如《豳風·七月》描寫 30 餘種動植物，從中不僅可以學到很多博物學知識，而且由此可知農民們一年四季的艱苦勞作與受剝削之痛苦生活。所謂「群」，即人與物、人與人之間的和諧共處，亦即「民胞物與」之意。如《召南·甘棠》與《小雅·鹿鳴》，前者寫由於召伯曾在甘棠樹下聽訟斷獄，為民辦了許多好事。人們思念召伯的恩德，對甘棠樹發出了「勿剪勿伐」的保護令。因樹思人，因人護樹，以樹為友，人物相諧。後者寫國君宴飲群臣賓客，其樂融融，一派和睦氣象。此之謂「群」也。所謂「怨」，

¹⁷ 牟世金：《詩學之正源，法度之準則[A]·古代文學理論研究（第一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38-61），頁 38。

¹⁸ 楊伯峻：《論語譯注》。（北京：中華書局，1980），頁 185。

即對統治階級的怨憤與諷刺，以及詩作者對自己不幸遭遇的哀怨之情。如《魏風·碩鼠》、《邶風·新台》、《鄘風·相鼠》等，都是對統治階級進行強烈諷刺的力作，為後世開啓了諷刺手法的無數法門。總之，孔子所說的「興、觀、群、怨」，它們是建立在「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基礎之上的。因為從「鳥獸草木」之中，能夠感悟到人之思想、道德與情感，給人以思想與智慧的啓迪。孔子本人就從大自然的現象中屢屢感悟到人生的哲理之美。如：「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也。」（《論語·子罕》）「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論語·子罕》）。前者，由松柏經寒不凋之自然現象，聯想到人應該歷經磨煉而節操不變、意志剛強；後者由晝夜不停流淌的河水，感悟到時間飛快如流水一去不返，警示人們應珍惜時光，不斷創造有價值的人生。再如《周南·樛木》，這是一首以草木彼此纏附之象徵友愛親情之樂的一首詩：「這首詩所歌詠的草木狀，簡直就是一幅表現儒家所主張的『仁者愛人』思想的生動圖畫。」¹⁹ 正因為《詩經》的「鳥獸草木」之中寓含著如此豐厚的「仁、義、禮、智、信」等儒家思想的內容，可以給人以「興、觀、群、怨」的詩教啓迪，所以，從近處講，可用其中的道理來孝順父母；從遠處看，可用其中的智慧來忠於君王。也正是由於《詩經》中的「鳥獸草木」具有如此重要的詩教功用，因此，孔子才在最後又進一步強調說：「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總之，在孔子這段論述中，「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這句話，委實是整段話中最為重要的核心話語。然而，它卻長期為人們所忽略。這樣一來，人們對此段話理解的偏差，自然也就難免焉。通過以上簡要的分析，我們也就不難理解孔子傾畢生精力整理《詩三百》的良苦用心了，也不難理解他強調的「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的文化審美價值了，更難理解他「不學《詩》無以言」（《論語·季氏》）之論斷的重要意義了。在孔子看來，《詩三百》的確是一部不可多得的人生好教材。直至今日，《詩經》仍然在思想價值與文學意義上發揮著人生教材的重要作用。

綜上所述，《詩經》中大量「鳥獸草木」的描寫，不僅是一種功能符號（從博物學層面看）與文化符號（從社會學層面看），而且是一種情感符號（從文藝學層面看），更是一種啓蒙符號（從教育學層面看）。從功能符號，到文化符號，再到情感符號，最後到啓蒙符號，正好體現了先民們對自然生態審美意識的演進之跡，營構了自然生態審美意識逐漸成熟的邏輯結構。要之，這四個知識層面的形成，都是先民們親近自然、關愛自然的結晶，也是孔子「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的深層內涵之所在。

在現代工業革命浪潮洶湧澎湃，經濟建設迅猛發展的今天，青山綠水日益污染，鳥獸草木日益減少。面對日益破壞的自然環境，有識之士不得不鄭重發出「保護自然」、「回歸自然」的強烈呼喚。

所謂人類回到自然的自然，是指具體的、有機的、美化的、神聖的外界而言，這個意義的自然，可以發人興會，欣人耳目，啟人心智，慰人靈魂，是與人類精神相通的。

¹⁹ 曾永成：〈釋「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的詩學內涵〉。（西南民族學院學報，2000（12）：45-49），頁 47。

這是有生命有靈魂的自然。人生需要自然來作育。人生需要自然供給力量。自然是人生的『淨化教育』。自然是人生力量的源泉。²⁰

無論是物質的，抑或是精神的；無論是生活的，還是文藝的，人們都離不開自然。本文就《詩經》中自然生態審美意識的不同層面與孔子「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深厚內涵進行初步探析，旨在激發與增強人們自然生態的審美意識，逐漸養成關愛自然、保護自然的良好習慣，為建設人類共同美好的家園奉獻應盡之力量。文中不當，敬祈方家同仁鑒而教之。

參考文獻

1. 宋·朱熹：《詩集傳》。（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58）
2. 清·方玉潤：《詩經原始》。（北京：中華書局，1986）
3. 清·劉熙載：《藝概》。（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4. 王國維著：《滕咸惠校注，人間詞話新注》。（濟南：齊魯書社，1986）
5. 聞一多：《說魚[A]·詩經研究》。（成都：巴蜀書社，2002.66-91）
6. 楊伯峻：《論語譯注》。（北京：中華書局，1980）
7. 楊公驥：《中國文學：第一分冊》。（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80）
8. 蘇珊·朗格：《藝術問題》。（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3）
9. 恩斯特·卡西爾：《人論》。（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1985）
10. 程俊英：《詩經譯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11. 程俊英：《蔣見元·詩經注釋》。（北京：中華書局，1991）
12. 王文生：《論情境》。（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2001）
13. 孫作雲：《詩經研究》。（鄭州：河南大學出版社，2003）
14. 潘富俊、呂勝由：《詩經植物圖鑒》。（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3）
15. 葉舒憲：《詩經的文化闡釋》。（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2004）
16. 李澤厚：《論語今讀》。（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4）
17. 胡曉明：〈傳統詩歌與農業社會[J]·文學遺產，1987, (2):1-8〉
18. 牟世金：《詩學之正源，法度之準則[A]·古代文學理論研究（第一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38-61）
19. 曾永成：〈釋「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的詩學內涵〉。（西南民族學院學報，2000(12):45-49）
20. 賀麟：《自然與人生[A]·文化與人生》。（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2001:128-138）

²⁰ 賀麟：《自然與人生[A]·文化與人生》。（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2001:128-138），頁 129。

